

生命的^的美学地图

聆听智慧——在文学馆听讲座第二辑

陈漱渝 假如鲁迅活到今天

罗锦鳞 世界上最古老的希腊戏剧

曹文轩 艺术感觉与艺术创造

杨武能 思想家歌德

范伯群、袁良骏 关于“两个翅膀”的论争

王卫平 曹禺戏剧的误解、曲解与理解

萧耘、王建中 文坛独行侠——萧军

毕冰宾 永远的憧憬和追求

——劳伦斯的乡恋和创作

陈建功 名誉主编
傅光明 主
编

新世界出版社

聆听智慧——在文学馆听讲座第二辑

生命的^的美学地图

陈建功 名誉主编 傅光明 主 编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生命的美学地图/傅光明 主编 —北京: 新世界出版

社, 2005. 12

ISBN 7-80187-932-5

I. 生... II. 傅... III. 人生哲学—青年读物

IV. B82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47376 号

生命的美学地图

名誉主编: 陈建功

主 编: 傅光明

责任编辑: 刘春梅、李 林

责任印制: 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100037)

总编室电话: +86 10 6899 5424 6832 6679 (传真)

发行部电话: +86 10 6899 5968 6899 8733 (传真)

本社中文网址: <http://www.nwp.cn>

本社英文网址: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本社电子信箱: nwpcn@public.bta.net.cn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版权部电话: +86 10 6899 6306

印刷: 保定天德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640×960 1/16

字数: 240 千 印张: 18.5

印数: 1—6000

版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80187-932-5/G. 474

定价: 24.00 元

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陈漱渝 假如鲁迅活到今天——鲁迅的文化遗产与当代中国 1

1936年10月19日,当你溘然长逝的时候,曾留下遗嘱:“忘记我,管自己生活。”然而,67年以来,你的友与仇从来没有忘记你,在你棺木上覆盖“民族魂”锦旗的人民大众从来没有忘记你。你的死印证了马克思的名言:“死亡对于死者并非灾难,对于生者才是不幸。”

罗锦鳞 世界上最古老的希腊戏剧 21

在古希腊的悲剧中,它着意的是严肃,而不是悲惨,也不是悲切。它与我们的《钗头凤》、《红楼梦》可不一样。看中国悲剧得带两块手帕去,看希腊悲剧你不一定哭,但是看了以后,你感觉到很振奋,对你产生一种强大的震撼力。亚里士多德把这种悲剧的作用称为“卡塔西斯”(katharsis)作用。

曹文轩 艺术感觉与艺术创造 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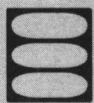
一个艺术家的本领不在于他对生活的强信号的接收,而在于他能接收到生活的微弱信号。中国当代小说家的薄弱之处,就在于他们感觉的粗糙,而缺乏细微的感觉。而事实上,往往正是这些细微之处藏着大主题、大精神和深刻的人性以及人的最基本的生存方式。

杨武能 思想家歌德 97

歌德曾经写过一篇长文《说不完的莎士比亚》,用个类似的题目来讲歌德我觉得也同样适合,可以叫做“说不完的歌德”。因为歌德的人生太丰富,他的业绩太伟大,他的思想太渊博,真是怎么说也说不完。

范伯群、袁良骏 关于“两个翅膀论”的论争 123

我们的老祖宗有两句话:一个叫当仁不让于师;一个叫和而不同(在和的前提下,可以有不同,不同也不妨碍和)。西方也有话,叫作“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可见中西文化也还有重要的交汇点,都强调对师可以争论,对友也可以争论。



王卫平 曹禺戏剧的误解、曲解与理解

163

在中国现当代戏剧界,没有哪一位剧作家像曹禺那样具有崇高的威望,也没有哪一位剧作家像曹禺那样赢得和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观众和研究者、改编者。然而,也没有哪一个剧作家的作品像曹禺的剧作那样在接受中伴随着那么多的误读、曲解、误解、批评、批判等现象。

萧 耘、王建中 文坛独行侠——萧军

183

有人说,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坛”,萧军是一个传奇性的、特殊的存在,没有谁能“像”萧军,他爱得上去,恨得上去,旗帜鲜明,侠肝义胆,豪杰般的猛士!——文坛独行侠!

毕冰实 永远的憧憬和追求——劳伦斯的乡恋与创作

227

没有与故乡血肉相连的体验和对故乡切肤的情仇,劳伦斯就不是劳伦斯;而离开后如果不是将故乡作为自己的文学源泉,劳伦斯也不能成为劳伦斯。

假如鲁迅活到今天

——鲁迅的文化遗产与当代中国

傅光明：今天我为大家请来的是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鲁迅研究专家，作家、学者陈漱渝先生。建国以来，每每遇到大的思潮或变革的时期，知识界就会常提出一个热门的焦点话题，也几乎是所有人都会关注的，就是“假如鲁迅活到今天”，他会怎么看？他会怎么想？他会怎么做？少不了许许多多见仁见智的“假设”。陈先生是研究鲁迅的专家，今天我们来听他的真知灼见《假如鲁迅活到今天——鲁迅的文化遗产与当代中国》。

陈漱渝
先生

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

在世界文化史上有三类文艺家。一类在他们生活的年代一度享有盛誉，但逐渐被读者淡忘了，比如英国戏剧家马洛（1564—1593），是中世纪戏剧的革新者。他的作品为莎士比亚的创作铺平了道路。马洛的剧本《马耳他岛的犹太人》影响了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他的另一个剧本《爱德华二世》影响了莎士比亚的《查理二世》。但当今的读者大多只知道莎士比亚，却不知道马洛，因此有人把马洛比喻为“皇室的奶妈”——哺育出了像国王般享有盛誉的文豪，而自己终究相当于一位鲜为人知的乳母。第二类文艺家在生前默默无闻，而他死后却声誉日隆。比如德国作曲家巴赫（1685—1750），他是近代奏鸣曲的奠基人。他生前鲜为人知，逝世整整一个世纪之后才逐渐被人们发现。中国的曹雪芹多少比巴赫幸运一些，但他的《红楼梦》也是在他去世二十四年之后才开始刻印问世。还有一类文艺家，他们的作品既是当代的文化财富，又是后世的精神资源，鲁迅显然应该划归为这一类作家。他生前就是读者的良师益友，死后仍然是我们生活中“缺席的在场者”。完全可以断言，如果没有屈原，没有李白、杜甫，没有曹雪芹、吴敬梓，没有鲁迅、巴金，中国文学史就不可能拥有金字塔般的辉煌。

鲁迅的文化遗产呈现出多方面的特征，粗略概括起来至少有三个：

- 一、惊人的丰富性；
- 二、鲜明的政治性；
- 三、强烈的现实性。

一、所谓丰富性，取决于鲁迅多方面的文化贡献。他是文学家，又是思想家，其思想又囊括了哲学思想、政治思想、伦理思想、美学思想、教育思想，等等，共同构成了一个博大的思维世界，积淀成了一座经得起持续开发的宝藏。这样，鲁迅研究就必然成为一种持续性的多视角研究，不同时代的不同视角具有各自的意义和价值，可以相互增补却无法彼此取代。正是这种历史性的多视角研究，使得鲁迅的文化遗产成为了对民族后续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精神资源。

二、政治性。政治是阶级、民族、社会集团之间基于各自根本利益所发生的相互关系以及与此相关的活动。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它贯穿于不同历史时期，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鲁迅生活在中国遭受列强欺凌、中国人有可能从“世界人”中被挤出的时代。长夜如磐，饿殍遍地，中国民众不仅受到剥削和压迫，连生存权都难以保障，而且受到宗法制度和礼教的精神虐杀。因此，鲁迅的文化遗产与现代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如果排除了宏观的、远大的、深刻的政治意识，我们就无法理解鲁迅文化批评与社会批评的深刻内涵。

大家记忆犹新的是，在极“左”路线干扰下，一度高喊过“文学从属于政治”或“文学是阶级斗争工具”的口号，抹杀了文学不可或缺的艺术特质。这引起广大读者的反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厌恶和尚而恨及袈裟。政治从来都具有不同的性质，比如，腐败是一种政治现象，反腐败也是一种政治现象。我们不能因为反对“从属论”和“工具论”而在政治跟“政治实用主义”或“极‘左’路线”之间划上等号，完全排除文学作品中或隐或显、或强或淡的政治性。不错，1927年底鲁迅写过一篇文章：《文艺与政治的歧途》。这篇讲演中提到文艺跟政治经常发生冲突。但这里所讲的政治仅仅是那种维持落后现状、扼杀思想自由的政治，也就是专制政治。只要认真阅读这篇文章，就能发现它本身就是一篇革命宣言，具有极其强烈的政治色彩。当然，鲁迅所说的革命，既包括暴力革命，也包括了和平渐进。

三、现实性。鲁迅进行创作既不沉湎于古代，也不把未来的黄金世界轻易许诺给读者，而是执着于现实，密切关注中国人的生存现状，从现代中国人生存、温饱和发展的角度来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他揭露那种自以为超然物外的作家，反对那种主张离开人生，专讲“梦”的文学，更不认同把创作单纯当成个人情感渲泄的文艺理论。他明确宣布：“以为艺术是艺术家的‘灵感’的爆发，像鼻子发痒的人，只要打出喷嚏来就浑身舒服，一了百了的时

候已经过去了。”（《且介亭杂文·论“旧形式的采用”》）他热烈号召：“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它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坟·论睁了眼看》）正是由于鲁迅文化遗产本身具有的丰富性、政治性、现实性，使得我们研究其当代意义不仅可能，而且必要。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文化遗产的研究通常包含着纯学科研究与该学科当代性研究这两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纯学科研究可以提高学科的学术水平，当代性研究可以使该学科在不断阐释过程中得到价值增值。这种效应可以称之为“箭垛”效应。文化遗产好比箭垛的中心，各种阐释好比是各处射来的飞箭。万箭丛集，蔚为壮观。只要这种当代阐释是从文化遗产的实际出发而不是强加于人，就跟实用主义的歪曲利用划清了界限。比如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原来是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中的一家，今天被称之为原始儒学。但到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就成为了官方学说，为历代帝王所利用，直到上世纪初才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风暴中受到冲击，终止其垄断地位。但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孔子作为伟大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哲学家的地位又被重新确定。不少学者（如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在思考如何在现代中国发挥儒家思想的应有作用。如在市场经济中讲“诚信”，在人际关系中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外敌面前讲“舍生取义”的民族气节，在处理国家利益时讲“先天下之忧而忧”，在处理师生关系时讲“尊师重道”，等等。我想，只要是从儒家思想本身出发，这种现代阐释就不会导致牵强附会。基于这种理解，我今天试图综合运用文学研究和社会学研究的方法，尝试着对鲁迅进行一番当代阐释。

关心鲁迅研究的人都知道，当前有一个热门话题：“假如鲁迅活着”。有不少讨论文章，还有一本选编的同名读物。记得1990年秋季，我在台北一个规模盛大的学术研讨会上发言。语音刚落，就有一位台湾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员站起来“修理”我。在台湾用语中，“修理”二字含有质疑、挑剔、挑战、挑衅等多重意思。那位学者

问：“听说陈先生是研究鲁迅的专家。请问：如果鲁迅活到今天，来到经济繁荣、政治民主的中华民国，将会有什么感想？”这让我有点两难：如果迎合他，说些捧场的话，将使我丧失立场，违背本意；如果反击他，揭露台湾阴暗面，又会破坏会场的学术气氛。我当时作了这样的回答：“历史是不能假设的，因为鲁迅事实上已经在 1936 年逝世。他不可能再说话，不会再写文章。对于这类假设性的问题，不同人会有不同的答案。比如，胡适说，鲁迅今天若不死，天安门前等杀头；而毛泽东说，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是更多的可能是会写的。俗话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我对那位台湾学者说：“我们之间文化背景不一样，政治理念不一样，辩论这种假设性的问题，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这样一来那位台湾学者就不再说什么话了。台湾媒体的一些记者认为我的回答很得体。

的确，“假如鲁迅活着”这样一个问题像一面镜子，映照出不同人各不相同的鲁迅观，也反映出不同人对当代命运的不同思索。这本来是一种正常现象。但有个别标榜宽容的学者其实并不宽容。别人跟他的看法有出入，他就自比鲁迅，将对方比附为北洋军阀门下的章士钊。我认为这种学风是不利于学术繁荣的。基于上述现状，我在此郑重声明，我今天谈“假如鲁迅活着”，谈鲁迅遗产的当代意义，这反映的仅仅是我心目中的鲁迅，也折射出我对当代中国问题的一些思索，只能作为当今众声喧哗中的一种声音供诸位参考。不妥之处，也希望诸位能够坦诚地批评。

首先我想谈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即“鲁迅假如活着”会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抱什么态度？有些权威学者说，鲁迅已经预感到革命胜利之后他不一定有好下场，例证主要有两个：一、鲁迅 1934 年 4 月 30 日致曹聚仁信中说：“……倘当崩溃之际，竟尚幸存，当乞红背心扫上海马路耳。”“崩溃”，指旧政权倒台，那时他可能发配去扫

马路——“红背心”指清洁工人的工作服。二、1936年鲁迅跟青年友人李霁野谈起冯雪峰——雪峰是沟通鲁迅跟陕北党中央的桥梁。冯雪峰向鲁迅谈起革命的大好形势。鲁迅开了一个玩笑：“你们来了，还不先杀掉我！”雪峰连连摆手摇头，认真地说：“那不会，那不会！”鲁迅以此说明雪峰是个老实人，但言语之间也流露出他对“左”倾路线的隐忧。

大家知道，任何谈话和通信都有其特定的背景和语境。我们没看到曹聚仁的来信，不知道鲁迅是在什么特定语境中谈到旧中国崩溃后他有可能去扫马路。我们也无法确定鲁迅所说的要先杀他祭旗的究竟是什么人。但是，鲁迅对革命胜利之后知识分子命运的思索并非是杞人忧天。首先，作为一个痛苦的清醒者，鲁迅从来就没有对革命抱有罗曼蒂克的幻想。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中鲁迅就明确告诫当时羽翼未丰的文学青年：“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决不是如诗人所想像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

其次，鲁迅亲历过1928年左翼文学阵营内部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和1935年底至1936年的“两个口号”论争，目睹过当时那些患“左”倾幼稚病的文学家摆出了多么横暴的面孔。比如，后期创造者的冯乃超说鲁迅是“醉眼陶然”看人生，他的作品反映的是“没落的封建情绪”和“落伍者的悲哀”。成仿吾也说鲁迅是“有闲阶级”、“没落者”。郭沫若更将这种情绪发挥到极致，干脆派定鲁迅是“二重性的反革命的人物”，是一位“不得志的法西斯蒂”。所以鲁迅在《“醉眼”中的朦胧》一文中预见这些人得志之后，他只好靠扫地混半块面包吃；如果这些人真正掌握了生杀大权，那他可能会被划归到“贵族或皇帝阶级里，至少也得充军到北极圈内去了”。鲁迅在“两个口号”论争过程中的遭遇大家也是十分熟悉的，不必详谈。

最近，中央档案馆公布了一封1936年7月17日鲁迅致瞿秋白夫人杨之华的书信，其中提到，有些“国防文学”的倡导者在他重病期间仍想用“伟大的旗子”杀他祭旗，使他“心绪很恶劣，连写信讲讲的勇气也没有了”。然而难能可贵的是，即使在十分恶劣的心

境下，鲁迅也没有对革命的前途丧失信心。就是在致杨之华的同一封信中，鲁迅提到他在“几乎死掉了”（指1936年6月6日至30日一度病危）的情况下，仍坚持编辑出版瞿秋白烈士的译文集《海上述林》，可见他并不是把共产党组织中的成员看成是铁板一块，而是将其中的优秀代表人物跟有错误倾向的人加以严格区分。鲁迅当时仅仅编选瞿秋白的译文而没有编选瞿的著作，是因为瞿的作品政治性强，应该将来留待党组织审查筛选。

1936年10月15日，即鲁迅去世前四天，鲁迅在写给美术青年曹白的信中说：“《述林》是纪念的意义居多，所以竭力保存原样，译名不加统一，原文也不注了，有些错处，我也并不改正——由将来中国的公漠学院来办罢。”“公漠”，是Communism的音译，即共产主义。公漠学院指共产主义学院，即革命政权建立的权威学术机构。这就有力说明，鲁迅临终前仍对革命事业怀有乐观信念，并没有因为受到少数有错误倾向的人的打击就背弃了自己的信仰。这种政治立场在鲁迅最后的几篇杂文中表现得更加清楚。比如，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鲁迅就旗帜鲜明地宣布：“中国目前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那理由就因为我不仅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

鲁迅为什么会站到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我认为归根结底是中国现实生活的启示。鲁迅出生于行将崩溃的封建旧营垒，青年时代寄希望于辛亥革命，中年又一度寄希望于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的北伐战争。后来目睹了辛亥革命失败，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中国社会一天天更加沉入黑暗；特别是亲历了1927年4月国民党发动的清党运动，被这场“血的游戏”吓得目瞪口呆，鲁迅这才毅然决然地站到了被摧残、被镇压的中国共产党一边。鲁迅拥护中国共产党，并不是看其宣言，听其口号，而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当时“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假如鲁迅活着”，看到党中央新一代领导集体重申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语重心长地告诫各级领导干部，要做到心里装着群众，凡事想着群众，工作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要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为群众诚心诚意办实事，尽心竭力解难事，坚持不懈做好事（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2003年7月1日），鲁迅肯定会心悦诚服地拥护。当然，鲁迅也更清楚地看到，真正的宣传，必须用今天或今后的事实来证明。在《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序》中鲁迅说：“宣传这两个字，在中国实在是被糟蹋得太不成样子了，人们看惯了什么阔人的通电，什么会议的宣言，什么名人的谈话，发表之后，立刻无影无踪，还不如一个屁臭得长久，于是渐以为凡是讲述远处或将来的优点的文字，都是欺人之谈，所谓宣传，是一个为了自利，而漫天说谎的雅号。”所以，党中央如今强调“切实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具体地深入地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鲁迅如果活到今天，对这一点肯定更会心悦诚服地拥护。

假如鲁迅活到今天，对于中国坚持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会有什么看法？我觉得鲁迅同样会持肯定的态度。这并不是强加于鲁迅。五四时期，有形形色色的主义在中国传播，除开马克思主义之外，还有实用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新村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等，一起涌进了思想的自由市场。鲁迅当时并没有服膺什么主义，也没有宣扬什么主义。1925年3月11日鲁迅给许广平的回信中坦率地说：“假使我真有指导青年的本领——无论指导得错不错——我决不藏匿起来，但可惜我连自己也没有指南针，到现在还是乱闯。”但到1927年之后，鲁迅已经有了鲜明的社会主义倾向。这不但能从鲁迅肯定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系列文章中得到证实，而且在鲁迅同时代人的回忆录中也能得到证实。萧红《回忆鲁迅先生》一文中有这样一个片断：“鲁迅先生坐在XX电影院楼上第一排，那片名忘记了，新闻片是苏联纪念五一节的红场。‘这个我怕看不到的……你们将来可以看得到’。鲁迅先生向我们周围的人说。”在现存的鲁迅回忆录中，萧红的回忆公认为最真实生动，这篇

文章提供的史料无疑是可信的。另一位日本友人长尾景和在他的回忆文章《在上海“花园庄”我认识了鲁迅》中也提到，鲁迅“肯定地说，中国一定要走向共产主义，通过社会主义来拯救中国，此外没有别的道路可走。将来中国也一定会这样的”。这篇文章，可以作为萧红回忆的一个旁证。

有人说，现在苏联已经解体，中国也正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可见鲁迅的看法过时了，他当时被苏联的宣传所蒙蔽。鲁迅有一篇杂文题目是《我们不再受骗了》，实际上受骗的是鲁迅本人。我认为这是一种相当表面的看法，不足为训。鲁迅在文章中对苏联的肯定主要是两点：一、十月革命之后，苏联消灭了农奴制。千百万奴隶从地狱里涌出来，成为了支配自己命运的人。二、十月革命之后，苏联由农业国发展成为工业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一片萧条，而苏联的小麦出口，煤油出口，使世界震惊。我认为，鲁迅评价社会制度的标尺主要是这么两个：一看是否有利于人的解放，也就是人权的尺度；二看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提高，也就是生产力的尺度。这两个标尺今天也完全正确。

什么是社会主义？当前有各种各样的定义。在我看来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有两条：一条是平等的原则，另一条是发展的原则。所谓平等也就是社会公平，主要表现为对公民幸福和福利的高度关注，特别是弱势群体福利和社会保障的关注。所谓发展就是要追求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果。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来谈平等就会流于空想，其后果就是全社会的普遍贫困。贫困不是社会主义，像格鲁吉亚，人均月收入才 23 美金，前总统月薪才 200 美金，这就会引发所谓“天鹅绒革命”。但离开平等讲发展会导致贫富两极分化，这也背离了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当然，富裕不可能同步富裕，在达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必然有先有后，有快有慢，不过不能差距过大，以致偏离了共同富裕的方向。

“假如鲁迅活着”，看到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取得的辉煌业绩，一定会为之欢欣鼓舞。在过去的五年中，我国经济每年

都保持了7%以上的增长速度，去年经济总量跃过了10万亿元。今年我国经济发展虽然受到了SARS病情和其他自然灾害的冲击，但今年GDP增长速度仍将提高到8.6%，国内生产总值将突破11万亿元。据有关专家说，这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估计，真实增长率可能会更高一点。特别是中国人对住房、汽车、通讯消费的需求大幅度增长，不仅使国内通货紧缩的顽症不治而愈，而且带动了世界经济的复苏。如果看到闰土的后代走进了大学殿堂，祥林嫂的伙伴们成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半边天，华小栓和宝儿生病能得到及时医治，《一件小事》中的人力车夫成为了北京“的哥”，爱姑们离婚结婚手续得到了简化，鲁迅肯定会含笑于九泉。

但是，“假如鲁迅活着”，也会对当前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表示忧虑和关注。所谓贫与富是一种生存环境和生活状况。应该看到，贫富差距扩大是一种世界性趋势——目前，全球1%的富人已经占有全球80%的财富，富国跟穷国人均收入的差距达到了430倍。在不同国家，贫富的标准也并不一样，但粗略划分，贫可分为赤贫与贫困。所谓赤贫指生存性贫困，即食不裹腹，衣不遮体。根据联合国制定的标准，生活费每天低于1美金者为赤贫，这类人在全球有15亿；生活费每天不足2美金为贫困，这类人在全球有30亿。也就是说，目前全球有一半人口是生活在贫困之中；其中大部分生活在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富可分为先富和暴富两个群体，他们致富有合法与非法两个渠道，他们的财富因而可分为可以公开来源的“阳光财富”和来源不可告人的“肮脏财富”。

我国贫困线是根据食物贫困线和非食物贫困线两项指标之和确定的。根据今年两会期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2001年我国农村的贫困人口有2927万。因此解决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就成为了国家经济生活中的重中之重。城市贫困群体也不少。据统计，今年下岗职工有600万，登记失业人员有800万，新增劳动力有1000万，所以解决就业问题形势也相当严峻。今年夏天，我去东北进行了一次考察，重点视察了那些煤炭、石油、木材进入枯竭期的

城市，发现那些地方有待解决的问题很多。比如，小兴安岭的林木资源已经减少了98%，林场42%的职工处于闲置状态。抚顺西露天煤矿经过数十年开采挖掘，只遗留下两个6.6公里长、2公里宽的大坑。鹤岗煤矿区发生大面积沉陷，每年下沉一米三，时有事故发生。

据冯雪峰回忆，鲁迅生前曾酝酿写一篇关于“穷”的杂文，大意是：“穷并不是好，要改变一向以为穷是好的观念，因为穷就是弱。比如原始社会的共产主义，是因为穷，那样的共产主义，我们不要。”“个人的富固然不好，但个人穷也没有什么好。归根结底，以社会为前提，社会就穷不得。”（《鲁迅先生计划而未完成的著作》，1937年上海《宇宙锋》十日刊第50期）。鉴于我国目前地区、城市、行业、群体收入差距扩大，中间层收入相对下降，三农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的形势，党中央新一代领导集体在决策时强调城乡的统筹发展，区域的统筹发展，经济和社会的统筹发展，人和自然的和谐统筹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统筹发展。根据鲁迅的思想实际，他对这些举措肯定会由衷拥护的。

“假如鲁迅活着”，对于今天两个文明建设的现状会有什么看法？我想，鲁迅首先会肯定当代中国人精神面貌的改变。早在青年时代，鲁迅就在论文中强调要“重个人”，即张扬人的个性，发挥人的独创精神，使人性能得到全面发展。他强调“个人”跟“害人利己”是两个概念，决不能混为一谈。跟文化大革命以前相比，中国人有了更多的自我意识、民主意识、法制意识、商品意识、竞争意识、监督意识……鲁迅活到今天，对于这一点自然会持肯定态度。但是，在两个文明建设过程中出现的“一手硬、一手软”现象，鲁迅又肯定会不以为然，因为他期待的是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交融，精神文明跟物质文明的同步发展。

在纪念鲁迅诞生六十周年的时候，理论家周扬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精神界之战士》。周扬援引了鲁迅《摩罗诗力说》一文中的名句：“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说明鲁迅从事文艺活动的宗旨，就是改造中国国民性，提升中国人的精神境界，净化